



· 国际问题研究丛书 ·

中国负责任大国 角色的建构

角色理论视角下的实证分析

徐正源 著



On China's
Role-Construction as a
Responsible Power:
A Positivist Analysis
by the Approach of
Role Theory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 —

中国负责任大国 角色的建构

角色理论视角下的实证分析

徐世昌 著

The Chinese
Power Country Role and
Responsible Power
in Postwar Asia:
An Empirical Analysis
from a Role Theory
Perspective

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

· 国际问题研究丛书 ·

中国负责任大国 角色的建构

角色理论视角下的实证分析

徐正源 著

On China's
Role-Construction as a
Responsible Power:
A Positivist Analysis
by the Approach of
Role Theory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负责任大国角色的建构：角色理论视角下的实证分析/徐正源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6

(国际问题研究丛书)

ISBN 978-7-300-16027-6

I. ①中… II. ①徐… III. ①国际关系-研究-中国 IV. ①D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31548 号

国际问题研究丛书

中国负责任大国角色的建构：角色理论视角下的实证分析

徐正源 著

Zhongguo Fuzeren Daguo Juese de Jiangou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12.5 插页 1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01 000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自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美国经济受金融危机打击严重，至今复苏缓慢；欧洲仍深受主权债务危机的困扰，欧元区的强劲扩张势头遭受重挫。而作为新兴经济体代表的中国却脱颖而出，不仅国民生产总值迅速跃居世界第二，获得了对世界经济的更大影响力，而且中国还积极活跃于 20 国集团、金砖五国等诸多机制平台上，拥有了更大的国际政治经济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毫无疑问，当前的中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

但是，中国还来不及为刚刚获得的较为有利的国际政治经济影响力和因此而更加凸显的大国地位而庆幸，诸多棘手的外交难题就已接踵而至。例如，在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的最初几年里，国际舆论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作为经济一直维持较快增长的大国，也作为曾在多个国际或国内场合频繁以“负责任大国”指称自身的大国，面对惨淡的欧洲和有可能崩溃的欧元区经济，中国应该伸出援手、慷慨解囊，还是依循旧例、韬光养晦、继续集中精力于国内发展？这关系到中国对国际责任的理解以及对负责任大国内涵的界定，考验着中国政府的外交智慧，也预示着即将成长为世界大国的中国的行事风格。

对此，中国政府的反应是：领导人出访欧洲，购买希腊等受危机打击严重的国家的主权债务，加强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沟通，并与其他金砖国家一起探讨促进欧洲乃至世界经济复苏的办法。这其中，中国既郑重承诺帮助欧洲，坚定国际社会和市场的信心，又积极奔走，通过参加欧洲金融稳定机制、参股欧洲公司以及扩大从欧洲的进口等方式，为

解决问题贡献了切实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中国始终注重与他国的协商和协调，注重依靠国际机制的力量来达成目标，这种行事风格与某些大国奉行的单边主义形成了鲜明对比。可见，中国以恰当的方式践行了负责任大国的理念，向国际社会明确传递出了合作与负责的信息，中国已经以自信、成熟的负责任大国的姿态登上了世界舞台。

当然，中国成长为负责任大国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建构过程。具体说来，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重要阶段：

首先，在冷战及冷战结束之初的艰难时局过后，中国的经济开始重新起飞，以1994年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酝酿为契机，中国开始渐渐摆脱对“大国”概念的负面价值判断，开始接受自身“大国”的定位。其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激发了中国成为负责任大国的强烈主观意愿，中国明确提出“做负责任大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并为周边国家提供多种形式的经济援助。在此后的十年中，中国围绕着国际社会的期望和自身对国际责任的理解，积极调适和建构。到2006年，中国政府自信地向世界宣布，中国已成为一个负责任大国。而2006年至今正是中国以负责任大国姿态活跃于世界舞台、积极履行大国责任的阶段，我们看到的中国对欧债危机的恰当反应正是中国对负责任大国理念的践行。

在这个阶段性发展的过程中，1997—2006的十年是中国负责任大国角色的关键建构时期。在该阶段，中国在自身传统文化心理、外界压力与激励，以及内在适应和学习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了负责任大国的角色认知，并在外交实践中不断彰显负责与合作的特征。了解这一时期中国负责任大国角色的形成动因，探究其形成机制，洞悉其中的局限和两难对我们诠释当前中国有关国际责任的理解和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作者采用角色理论的视角和实证主义的方法对该阶段中国负责任大国角色的建构进行探析，这在当时和当前都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作者也欣喜地看到，近年来对中国负责任大国角色建构进行研究的学术成果迅速增多。如果本书能为该问题的研究和讨论贡献微薄力量，作者将深感欣慰。当然，毕竟中国负责任大国角色的建构还是中国外交的一个新课题，加之作者才学浅陋，书中的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第 1 章 导言	1
1.1 问题的提出	1
1.2 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既有解释及不足	6
1.3 材料收集和研究方法的说明	15
1.4 个案的选择理由及有关说明	18
1.5 本项研究的结构安排	18
1.6 本项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20
第 2 章 社会学视野下的中国外交研究：角色理论及其适用性分析	22
2.1 社会学理论范式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应用	22
2.2 角色理论在外交政策研究中的应用	33
2.3 角色理论对中国外交研究的适用性分析	42
第 3 章 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角色认知：基于重要官方文件的文本分析	46
3.1 中国国家角色认知的转变：1997—2006 年间三次 中共党代会报告的文本解读	47
3.2 中国国家角色认知的转变：重要国际文件的文本解读	63
3.3 中国负责任大国角色的类型分布及其根本内涵	68
3.4 中国负责任大国角色认知的特征分析	81

第4章 中国负责任大国角色认知：基于中观层次的形成机制分析	85
4.1 中国负责任大国角色认知的形成背景	85
4.2 中国负责任大国角色认知形成的影响因素	89
4.3 中国负责任大国角色认知的形成机制：理性选择机制到 合法性机制的过渡	91
第5章 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角色实践：基于外交部发言人 言论的整体分析	102
5.1 中国国家角色实践的整体审视	102
5.2 角色认知影响下的角色实践：外交部发言人言论的 数据分析	114
5.3 中国国家角色实践的特征分析	124
第6章 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角色实践：基于中国外交实践的 个案分析	127
6.1 个案研究一：亚洲金融危机中的中国外交	128
6.2 个案研究二：中国参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及其在朝核 问题中的角色实践	142
第7章 结论与讨论	158
7.1 中国国家角色认知与角色实践：实证检验下的 观念建构	158
7.2 中国角色建构中的角色冲突与角色认同的 显要性序列	161
7.3 中国负责任大国角色未来建构的基本策略及 角色冲突的解决	169
7.4 中国个案对未来崛起大国的启示	171
附表一 1997—2006 年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言论中各项责任的 被提及次数统计	174
附表二 不同领域责任的被提及次数统计	175
附表三 合作性责任与冲突性责任的被提及次数统计	176
参考文献	177
后 记	191

导 言



1.1 问题的提出

1.1.1 中国“新外交”的出现

冷战结束之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外交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变化,被国内外一些学者视为中国“新外交”的出现。^①这不仅反映在由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中国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和国际影响力的显著扩大,更体现为诸多外交新理念的产生与外交实践方式上的新变化。因而,如何解释这种变化、如何理解其对中国外交未来发展的影响,就成为当前中国外交研究中的前沿性问题之一。

中国“新外交”的出现首先基于冷战后中国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国家实力快速崛起这一重要经验事实。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经济的起飞以及由此带来的国家权力的持续增长是中国外交理念和实践方式转变的最重要的动因之一。在过去的30余年中,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接近10%,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在其他大国经济普遍低迷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更是作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推动着地区乃至世界经济向前发展。除此之外,中国对国际和地区事务的贡献不断增加,在日益得到国际社会和周

^① Evan Medeiros & Taylor Fravel, “China’s New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03, Vol. 82, No. 6; 苏长和:《发现中国新外交——多边国际制度与中国外交新思维》,载《国际经济与政治》,2005(4)。

边国家认可和称赞的同时，其国际影响力也不断拓展，软权力因而获得较大幅度的提升。

中国国家实力的迅速崛起对于中国外交的意义在于：中国的国际地位因此获得较大的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已经不容忽视。这一方面导致了国际和国内“中国崛起论”的出现，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中国威胁论”的加剧。

事实上，真正引发别国担忧的并不仅仅是中国日益增长的权力，更是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将如何使用这种权力。对此，尽管中国一再承诺和平崛起，但是一些国家仍然不能确定这种表态的隐含意义到底是中国彻底接受国际规范、不寻求挑战现有秩序的“立地成佛”，还是在韬光养晦、和平崛起之后重新寻求变革国际秩序的“卧薪尝胆”。对此，作为对“中国崛起论”和“中国威胁论”的回应，也出于自身在实力增长后对发挥更大国际作用的内在要求，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中国在外交理念和外交实践上进行了新的调适。

在理念层面上，诸多外交新理念的提出凸显了中国作为大国对于国际社会的责任意识。例如，在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方面，中国倡导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主张国家之间进行安全合作；在发展方面，中国提出了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等新主张；在国际秩序观上，中国则提出了文明多样性和“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全新理念，并将促进多极化、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等外交立场写进了中共党代会报告等重要官方文件中；而关于自身的崛起，中国则相继进行了“做负责任大国”、坚持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等立场表述。

在实践层面上，中国在处理双边关系、参与地区和全球多边国际机制的实践上也都出现了若干新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与世界主要大国和国家集团建立了形式多样的伙伴关系，主张通过大国合作维持国际秩序和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与交流进一步扩大，不仅建立了各种形式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支持也达到了新的水平；而在参与地区和国际机制上，中国外交实践的新变化表现得更为突出。中国彻底抛弃了过去加入和参与国际机制的疑虑，不仅最终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并积极参与到国际军控、人权等国际多边机制当中，还对地区机制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合作组织和亚洲博鳌论坛的成立、与东盟国家的“10+3”和“10+1”等合作机制的形成都包含着中国的巨大

努力。此外，中国还对一些国际热点问题、国际危机和全球性问题的解决表现出积极参与的态度，尤其对朝鲜核问题的和平解决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对于处于崛起过程中的中国来说，其外交理念和外交实践上的变化无论对其自身，还是对于整个国际体系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对其进行合理诠释就显得尤为重要。

1.1.2 对总体性解释框架的寻求

以上中国外交理念和外交实践的新变化为中国外交研究者们提出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即应该如何给出一个总体性解释。

回顾中国外交研究的现有文献，不难发现，既有研究成果中对具体问题和具体政策的研究较多，而对中国外交的整体性把握较少。尽管台湾问题、中美关系等问题对于中国的安全和发展意义重大，应该，也必须对其进行重点研究，但是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整体审视、对中国外交行为模式的整体分析同样不可缺少，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中国对自身外交战略方向的总体把握，影响着中国外交政策发展的基本走向。

纵观过去十余年的中国外交，可以发现，中国外交面对的根本性问题就是如何适应由自身实力迅速增长带来的国际和国内的变化，实现国家的顺利崛起，这也是一直以来中国最根本的国家利益之一。因此，中国外交战略与政策制定的根本出发点就是为了削弱“中国威胁论”的论调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中国实力发展的遏制和阻挠，消除国际社会其他国家对中国破坏性意图的推测，从而为中国日益崛起的国家实力寻找容纳的空间，为中国全面回归国际社会，并成为世界主要大国争取合法性。

与此相适应，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中国向世界作出了“做负责任大国”的明确宣示，此后诸多外交理念的提出和外交实践的展开都表现出了日益鲜明的和平、合作的性质和负责的特征，凸显了明确的大国责任意识。中国也因此得到了相应的、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和国际认可。可见，中国确实是在按照其所宣称的“做负责任大国”的理念来要求约束自己。而且，近年来，中国在诸多重要国际和国内场合频繁以“负责任大国”指称自身，也表明“做负责任大国”已经成为指导中国外交实践的中心理念。

从时间范围上看，这个变化过程也恰与中国于 1997 年明确宣示“做负责任大国”，并于 2006 年声明“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负责任的

国家”^①的区间相吻合。事实上，中国正是将“做负责任大国”作为和平崛起的根本出路，以此来规范和约束自身的外交理念和行为，并不断根据自身对负责任大国的理解和他者的期望进行外交实践。因而，有理由认为，对“负责任大国”角色的建构，无论从时间段的契合上看，还是从外交行为的变化逻辑上看，都成为贯穿过去十余年中国外交实践的根本逻辑主线，任何其他外交理念的提出和外交实践的进行都围绕着这一逻辑主线而展开，这为我们寻求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外交的总体解释框架指明了方向。

然而，这又带来了一系列逐步递进的逻辑提问，即如果中国正在进行负责任大国角色的建构，那么中国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角色建构？是出于利益驱动，还是出于自身对该角色的认同？中国对自身角色如何认知？中国对负责任大国角色如何界定？中国又是如何界定与自身不断膨胀的国家权力相称的国际责任的？这种界定与国际社会的预期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应如何弥补其间的差距？中国负责任大国角色根本内涵的形成机制是怎样的？该认知今后的发展方向是什么？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角色建构对今后的大国崛起具有何种借鉴意义？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同样需要总体性的解释框架。

1.1.3 本项研究的理论意义及现实意义

本研究以最近十年中国外交出现的新变化为研究对象，分析此间中国负责任大国角色的建构，这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项研究的理论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本研究通过对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外交产生的阶段性变化的分析，发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角色建构的内在逻辑主线，总结出了当前中国外交行为的总特征及其对负责任大国角色根本内涵的界定，这对促进中国外交行为模式的研究、找出当前中国外交总体解释框架，并探讨未来中国崛起的可能途径和方式具有一定的意义。

其次，作为正处于崛起阶段的大国，中国试图通过负责任大国角色的建构实现国家的和平崛起，这无疑是国际关系历史中一项新的尝试。因而，对 1997—2006 年间中国负责任大国角色的具体建构方式、可能

^① 《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实录》，见 http://news.xinhuanet.com/misc/2006-03/14/content_4301180.htm。

的方向，以及其中出现的角色冲突和两难状况进行研究，会对国际关系领域中有关大国崛起以及对国际体系转变的影响的研究有所助益。

最后，由于在当前的中国外交研究领域，使用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行中国外交研究的成果尚不多见，而使用社会学理论范式这一新兴的国际关系研究视角进行的分析则更为寥寥，所以，本项研究引入角色建构概念，从社会学的角色理论着手来分析中国外交行为的变化，探讨社会学理论范式对中国外交研究的适用性，这对促进中国外交研究理论分析工具的多样化具有一定的探索性意义；而中国外交作为角色理论和社会学理论范式应用的有益个案，也为其研究本身的完善和补充提供了契机，并为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的讨论添加了相应的经验素材。

在现实层面上，本项研究的意义首先体现在中国负责任大国概念的清晰化上。中国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适时地提出了“做负责任大国”的理念，开始重新审视、定义自身的权力和责任，并在国际政治实践中开始了负责任大国角色的建构。但是，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无论是关于大国权力与责任的关系，还是对负责任大国的角色含义以及负责任行为的评判标准，国际社会都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各国学术界也尚未进行适切的理论准备，甚至是中国自身也尚未对其给出清晰化的界定。这就给中国处理自身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带来了重大考验。鉴于此，本项研究通过对中国在诸多重要的国际国内场合进行的表态和相关重要官方文件的分析，归纳出中国负责任大国角色的根本内涵，从而使中国负责任大国角色获得了清晰化的含义。

其次，本项研究的现实意义也体现在对政策的指导性上。本项研究通过对中国负责任大国角色具体含义的探讨，分析了中国进行未来角色建构的适宜方式，并通过对自我角色认知和他者认知的差异状况及其成因的分析，尝试着提出了中国未来进行角色建构的基本方向，以及角色冲突和两难境况的可能解决途径。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当前中国外交政策和战略的制定提供了些许参考价值。

最后，本项研究的现实意义还在于对他国的借鉴性上。历史上，试图进行武力崛起的国家，如德国和日本，最终都未能避免失败的命运。鉴于此，中国作为历史上首个坚持以和平方式实现崛起的国家，尝试通过负责任大国角色的建构获得合法性和国际认同，其崛起方式以及国际角色的建构方式都将为未来的崛起大国提供一定的借鉴。



1.2 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 既有解释及不足

回溯近期的中国外交研究成果,可以欣喜地看到,当前从事中国外交研究的学者们学术视野开阔,研究范围广泛,已经为本领域的研究积累了丰硕的科研成果。这些成果是今后该领域研究向前发展的坚固基石以及外交决策制定的可靠参考。

但是,总体上看,不得不承认,当前关于中国外交的整体性、系统性理论阐释尚不多见。而对本项研究所进行实证分析的时间段,即1997—2006年间的中国外交行为模式进行总体性分析的文献则更是少之又少。许多学者似乎更加习惯于将冷战结束之后中国外交行为特征的演变作为一个统一的研究对象来进行考察。这样,本项研究在进行文献回顾时,将适当扩大回顾的时间范围。

从具体内容上看,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对冷战结束后中国外交新变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基本方面:一是变化的动因,即和平崛起方面;二是外交行为模式变化方面;三是负责任大国定位的诠释方面。

对于这些方面的研究,不同学者使用了不同的理论范式,主要包括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所属的理性主义理论范式以及反思主义所采用的社会学理论范式。^①其中,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因自身的理论局限,在冷战结束后中国外交演变问题上的解释力稍显欠缺。鉴于此,本项研究引入了角色建构的分析框架,以角色理论视角分析1997—2006年间的中国外交,在理论方法上属于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应用。因而,这里宜先对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外交研究进行评析,找出其理论解释的不足,从而为下文理论框架的建立做好铺垫。

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两大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都坚持因果性解释论,主张世界观上的物质主义和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以及认

^① Robert O. K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 in Robert O. Kohane, e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Boulder: Westview, 1989, pp. 158-179.

识论上的实证主义。而且,在理论论战的后期,二者还出现了分析层次相同、逻辑起点相同等其他趋同之处。^① 这些共同的理性主义特征使得两大主流理论在解释中国外交变化时,既有得力之处,也有相应的局限性。

1.2.1 现实主义理论的既有解释及不足

现实主义理论流派众多,既可以按照发展的历史脉络和理论的继承性,将其划分为以摩根索为代表的古典现实主义和以沃尔兹为旗手的结构现实主义;又可以因结构现实主义内部各分支理论的不同侧重点,将其具体细化为以沃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米尔斯海默主张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以及以吉尔平为代表的权力更替理论等^②;还可以依照研究视角的不同将其划分为结构现实主义、文化现实主义和地缘政治论等。

纵观冷战后中国外交的研究状况,作者发现,对中国外交行为的诠释多集中在国际体系、文明-文化和地缘政治三个方面。本研究采用最后一种分类方式,按照研究路径的不同来划分现实主义理论,并以此来考察其在中国外交研究中的应用。除上述三种视角外,在当前的中国外交研究中,以赵穗生(Suisheng Zhao)为代表的、强调中国外交实用主义特征的现实主义视角正在出现。^③ 因此,本研究力图从这四个角度来考察现实主义在中国外交研究中的运用。

这四种视角首先都坚持现实主义的一些共同的基本主张,如国家是国际政治中的理性行为主体,在无政府状态中寻求国家的利益、安全和权力等。^④ 其中,大国承担着维持国际秩序的责任。^⑤ 对于

① 参见秦亚青:《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从论争到趋同——第三次国际关系学理辩论的终结》,载《国际论坛》,2001(3)。

②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INC., 1979;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③ Suisheng Zhao, e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ragmatism and Strategic Behavior*, New York: An East Gate Book, 2004.

④ 参见[美]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INC., 1979.

⑤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INC., 1979.

大国崛起，沃尔兹、吉尔平、米尔斯海默等人都认为国家，尤其是大国具有扩张的需求，会引致国际社会的权力变更。^① 总体上，现实主义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外交研究关注中国国家实力的变化，强调中国国家实力的增长会打破国际体系力量的均衡，这也是学术界眼中“中国威胁论”的含义。因此，对于中国“和平崛起”的意图，现实主义者多半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意见。这既是出于历史视角下大国和平崛起案例的缺乏，也是其以利益和权力为核心的理论逻辑演绎所致。

具体到现实主义理论下的中国外交研究，首先，有的学者从国际体系的视角分析中国的崛起。这种视角认为国际体系对国家行为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大国的崛起会对国际秩序产生影响。从这种视角出发，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崛起必然会对现有国际体系造成冲击，尤其会使中国与霸权国形成矛盾。其中，国外学者如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罗斯·芒罗（Ross Munro）和江忆恩等，以及诸多国内学者如时殷弘、阎学通、金灿荣、张睿壮等认为中国作为新兴大国与霸权国美国的冲突不可避免^②，就此美国会使用遏制、接触等不同的应对战略^③，而中国则会相应地采用平衡、“搭便车”、维持现状、学习、适应、大国合作和积极融入等可能的战略方式予以应对，因此“做负责任大国”成为中国

①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INC., 1979; [美]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② 参见 [美] 理查德·伯恩斯坦、罗斯·芒罗：《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隋丽君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London: Routledge, 1999；阎学通、孙学峰：《中国崛起及其战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阎学通等：《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时殷弘：《新趋势、新格局、新规范》，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时殷弘：《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历史概观、战略思考》，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丁松泉：《中国崛起与中美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金灿荣：《中国能否走出和平崛起的新道路》，载《教学与研究》，2004（4）；卫灵：《当前国际环境下的中国外交战略与策略选择》，载《社会科学》，2002（3）；张睿壮：《中国应选择什么样的外交哲学》，载《战略与管理》，1999（1）。

③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London: Routledge, 1999；吉姆·赫尔姆斯、詹姆斯·普里斯特主编：《外交与威慑：美国对华战略》，张林宏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避免霸权打压的战略选择之一。^① 这种理论视角下的中国行为模式体现出明显的逐利特征，尤其是对经济利益和国家实力崛起的追求成为中国行为的主要动因，而中国对国际机制的积极参与行为则被诠释为利用国际机制对抗其他大国。^② 但是，迫于体系的压力，中国真正实现和平崛起的机会较小^③，台湾问题等爆发性问题有可能使中国陷于安全困境，甚至卷入战争^④。

但是，也有的学者在使用体系视角分析中国外交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比如陆伯彬（Robert Ross）认为，尽管中国的经济在发展，但是中国的整体实力水平尚难挑战世界霸权，不足以对国际体系造成较大冲击^⑤；沃勒斯坦认为，中国鉴于国内的政治和社会问题难以取代美国的霸权地位^⑥；而西格尔也认为不必对中国的崛起过于紧张^⑦。

其次，文明-文化视角是中国外交研究者进行现实主义分析的又一有益视角。这一视角强调国家的文化特性以及国家间的文化相容性是国

① 参见胡鞍钢主编：《中国战略构想》，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李宝俊：《新世纪之初中国对外关系的建构》，载《外交评论》，2005（10）；时殷弘：《中国崛起的条件：从对外关系角度的讨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6（1）；时殷弘：《关于中国的大国地位及其形象的思考》，载《国际经济评论》，1999（25）；门洪华：《中国国家战略利益的拓展》，载《战略与管理》，2003（2）；David M. Lampton, ed.,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Era of Refor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Elizabeth Economy & Michel Oksenberg, ed., *China Joins the World: Progres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9; Yongjin Zhang & Greg Austin, ed.,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sia Pacific Press, 2001.

② Tomas Christensen, "Chinese Realpolitik," *Foreign Affairs*, Vol. 75, No. 5, Sep-Oct. 1996, p. 37; Andrew J. Nathan, Robert S. Ross, *The Great Wall and the Empty Fortres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Press, 1999, pp. 4-7.

③ Weixing Hu, Gerald Chan, and Daojiong Zha, "Understanding China's Behavior in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in Weixing Hu, Gerald Chan, and Daojiong Zha, ed., *Chin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Dynamics of Paradigm Shifts*,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0.

④ Alastair I.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March 1, 2003), pp. 5-56.

⑤ Robert Ross, "Beijing as a Conservative 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76, No. 2, March/April 1997, p. 33.

⑥ 参见路爱国、[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的结构行危机与世界的未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4）。

⑦ Gerald Segal, "Does China Matter?"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 5, Sep/Oct 1998, pp. 24-36.